

往事如昨

第一次出门远行

栾亦浓

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，是离家到省外上大学。

当初的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华南理工大学(简称“华工”)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考大学、报志愿还是在高考前，我是复读生，报考华工是我复读时候的决定。

那时候母亲生病一年多，父亲陪着母亲在青岛和烟台两地跑，而我经历过一次失败有些沮丧，总觉得前途莫

测，不定考得上考不上。当时能上大学还是零零星星的，我甚至感觉高考除了自身努力外还有一点运气在里面。

因为母亲生病的缘故，当时的我特别想家，除了两周一次的例行放假时间，每一周或半周间都要磨着班主任请假一个晚上，坐着公交车回家看望母亲才安心。

及至报志愿的时候，班主任刘建民找我谈话，说是我平日里没少找他请假回家，

父亲当年出的最远的门是大连，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去他的二姑家探过一次亲，之后就再也没出过省。当时的火车还未提速，从烟台到广州也没有直达的列车，需要中间转车。父亲不得不为他女儿的任性去承担后果，他的心里是不是也曾打怵过呢？

即使而今的我，看着地图上的广州如此遥远，也深深叹服当年无知无畏的自己，为毫不顾及父母的艰难而羞愧。

后来，我大女儿考到广州的时候，刚开始觉得她回到我就读过的城市是心存开心和感念的，但当孩子踏

上火车那一刻，心里已经开始不舍了。太远了，有了想哭的冲动。女儿的每次往返坐火车或飞机，我每每都是牵肠挂肚的，愈加感受到父亲当年的心情了。有道是，养儿方知父母恩啊。

印象中，当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父亲却很开心，接下来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考虑如何去广州了，四处打听上一级、上上一级有没有考到华工的。期间，父亲和正在病中的母亲是否有难舍或为难？不得而知。

作为儿女的我，当时被考上名校的喜悦冲击着，大概是根本无暇顾及父母的感受，想的是开启新生活的

父亲是带着我从烟台到上海，然后转车到广州的。我们父女二人买的是通票，烟台到广州的通票到上海站后，要再转到上海西站签票，然后才登上到广州的绿皮车。

在去上海的列车上，遇到一位到上海海运学院的老乡，马上大三的一位男生，理个小平头，唏哩呼噜地对付他面前的饭食，吃完了，又开始剥橘子、喝袋装冰水。

我就静静地看着他，心里想着，这家伙把火车当自家了，心真大啊！而我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叽里咕噜叫起来，又饿又渴，但又不太敢吃东西，因为火车上的厕所里挤满了打工的人，是在半路一个名叫“漯河”的站点上了一帮拎着行李卷的打工人，他们为了省钱几乎统一在卫生间躲票。去一趟卫生间需要不停地拍打着过道里塞满的蹲着、坐着的人，到了卫生间门口还得拍打着门跟门里的人商量，通常情况下，门里的人是装

聋默不吱声的……

父亲跟对面男生聊起来，才知道我们竟然是同姓的，男生老家是海阳栾家庄的。老乡相遇的亲切感让父亲似乎心安一些，对于此时的父亲来说，这位小老乡也算是闯荡了两三年，可以交流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问题了。

也是从这老乡口中才得知我们到了上海站，还得转到上海西站去签票才能抵达广州。

“到上海后，晚上到我们学校住一宿，明天我把你们送到上海西站吧。”这位小老乡很是热情。

在他的帮助下，父亲和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，若是不然，大概当年的父亲和我就只能在火车站窝一宿了。

期间还有个插曲，专门为上大学准备的箱子办了火车托运，到学校一周后，箱子还未到。学院的师兄到火车站帮忙查找，才得知箱子上的标签托运中丢失，成了无人认领的物件……

第一次出远门也是唯

应该是很恋家的那种，“报考位于广州的华工，不如报大连理工吧，想家时一晚上的船就到了”。

我沉默半天没吱声，当时的自己其实有些反骨的，长辈越说啥我越喜欢对着干，就这么着真就选了华工。

现在看看，当初的自己多么任性啊！丝毫没考虑农村父母对于路途遥远的路费负担、孩子远在南方的担忧等因素。

欣喜，而不会为之后如何去广州的路途担忧。

为了这次出行，父亲多方打听，打听了七拐八拐的亲戚、打听了赶集摆摊卖布匹的摊位、打听了高中学校老师……还真被他打听到了一个去同一所大学的老乡，是离我们村子十里地左右村庄的一个男生。

父亲带着我去找人家，想要约着同行。对方犹豫很久，最后委婉地说，新生报到早，老生开学晚……不过，这男生也给我们指了几条中转的路子，指导我们如何到达广州。既如此，父亲自然感激不尽。

一的一次与父亲单独同行，当时的艰难而今想起来竟然有满满的幸福感。

父亲也未出过远门，但他为了女儿的学业从未打过退堂鼓，他通过超好的方向感、做小买卖自来熟的交际能力，一路过关斩将丝毫不怵。

当时的父亲多年轻啊，不到五十岁，虽然因为生计的操劳过早地被称呼上了“大爷”，却依然是少年的我心底最坚强的依靠。

记挂着家里生病的母亲，父亲很快便要返程了。除了车票钱，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我，而他回程路上是否顺利，节俭的他一路是怎么熬过的，他从未提起，而我竟然也理所当然地从未问起，现在想来真为任性的自己感到羞愧。

而今，年近八十的父亲连简单的对话都听得艰难了。我看着中国地图上烟台和广州这两个城市的名字，忆及这一切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方便面情结

尹浩洋

我有个嗜好，隔三岔五愿意吃点方便面，而且每次在机场、在动车上看到年轻人大大咧咧吃泡面时就会想：这一代年轻人多幸福啊！泡面的香气越来越浓，泡面的调料也越来越丰富了！

我第一次接触的方便面还不能叫泡面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在福山的门楼和古现教学的时候，方便面只是一块块白色的板砖样，但毫无疑问是很抢手的时尚食品，甚至算得上是农村校园里一种奢侈品。我任教的烟台十九中和烟台十八中虽然是高中，但是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并不高，有很多家庭生活很困难的孩子，他们念书真是很苦。

那时候，非高三的学生是可以每周回一次家的，一为想家念亲，最主要的是带一点下饭的菜回来。好一点家庭的，是带些有肉粒的炸酱罐罐，一般的家庭只能带些酱菜或萝卜咸菜、疙瘩头。有一次，我看到我一个学生骑自行车回来，车后绑着两棵大白菜，车前的车筐里带着两瓶酱油：酱油蘸大白菜叶，这就是他这一个周的下饭菜！

也因为这个，我养成了特殊的习惯。每次我在教工食堂里打上两份儿肉菜后，就会端着进到我班的教室，找到那些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孩子。当然是不露痕迹地把他们前后座儿围拢在一起，我坐在桌头上，然后说，“哈！我就喜欢吃你们的家常咸菜，咱们在一块儿互相交换着吃吧！”

在这种生活环境下，没有包装的方便面板儿出现了。那可是白面的呀！那可是经过油炸的呀！那甚至还可以撒点儿椒盐的呀！那种方便面小板儿，活生生成了农村学生们的高大上“点心”。所以，当他们看到我拿出方便面一掰两块儿四块儿分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连掰碎的渣都要小心收拾，放进嘴里嘎巴嘎巴嚼着咽下的。那种心满意足的快乐，我至今难以忘记。

那时候不叫泡面，因为没有杯，没有碗，只是一板儿一板儿的。我记得当时是一块儿卖4毛钱，有时候我找在新亚公司上班的同学——他们生产块儿的方便面，一次买一箱只要16元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，

我开始干记者了。《华夏酒报》把产酒最丰富又最偏远的西南地区让我负责。那时候没有动车，也不能经常坐飞机，出差的工具就只能是绿皮火车了。当年的绿皮火车非常慢，旅程就格外漫长，每次需要从烟台咣咣咣咣坐到上海真如，再从真如倒车分别到成都、重庆、贵阳和昆明。这一路颠簸的旅途，伴随着我的除了采访和构思写稿，就全是方便面的味道了。

那时候的方便面包装简单，料包也简单。我会加上烟台家乡的香肠——红肠，来解决泡面上味道缺乏的难题。这些，构成了我1990年到1992年所有的旅途回忆。

再后来，我返回家乡参与创刊了《烟台晚报》，当了首席记者，到各地的机会多了，与泡面的情缘从没有断过。

2002年，我到韩国采访，发现韩国的泡面比我们的泡面味道更丰富，尤其是他们的“农心面”。到了韩国发现，那里到处是辣白菜、辣萝卜。韩国人请我们吃饭，桌上摆了8个碟子，不是萝卜就是白菜，全都是他们的泡菜。吃泡面几乎成了一种奢侈。想不到的是在烟台几块钱可以买到的泡面，到了韩国要1500韩元才能吃上那么一碗。也就是说，按当时汇率，在韩国要吃一碗普通的泡面，至少你得花上20元钱。

2006年，我们到德国采访世界杯的时候，在法兰克福机场一落地，全国晚报团队所有记者就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：贵州的一位记者带了一个比他高一个头的大箱子。海关的人员怀疑里边儿有什么夹带，让他当场打开。结果打开大箱子一看，里边儿放了100多包方便面！这同行说，他出差多，知道在外边儿吃不着家乡饭是很难受的，所以他准备着一天至少吃3包方便面。我们在德国预计待40天，他就准备了至少120包方便面。也难怪他了，宁可营养不良，也要想着家乡的味道。要知道，很多人对德国的汉堡、热狗、香肠儿、啤酒还是很羡慕的。

这个春暖花开时节，我在旅途，吃着大碗的方便面，回忆的浓情满满。因为这方便面的情结里，有青春，有艰辛，有奋斗，有欢乐，有我过往生活的美好记忆。